

描绘石窟研究的多维学术图景

——第七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纪略

本报记者 赵永宏



第七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在云冈研究院开班

8月3日，云冈研究院内学者云集，第七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拉开帷幕。这一由云冈研究院、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以及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共同举办的学术活动，自2019年创办以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培养海内外学员数百人，成为中国石窟考古领域的重要学术品牌。本届工作坊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展现出三大创新特色：聚焦云冈7、8窟的深度研究、博士学员比例创历史新高（13位博士研究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鲜明导向。

开班仪式上，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致欢迎辞。他特别强调“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对话”，鼓励大家开展多角度、多学科研究，并思考石窟寺考古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一理念恰如一根红线，贯穿于后续丰富的学术活动中。

据了解，本届工作坊共招来自海

内外知名高校的学员16位，在未来10天中，将安排专家授课、学员研讨、洞窟实习、野外考察及成果汇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一、视觉的觉醒：美术史研究的微观视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的开篇讲座《美术史工作者如何使用眼睛——与2025年度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的朋友们聊天》，为工作坊奠定了方法论基调。郑岩提出的“细读”方法，要求研究者超越表象观察，深入视觉形式的内在逻辑。这种对“看”的重新定义，在云冈石窟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当面对那些被无数目光注视过的造像时，如何通过“视觉考古”发现新的问题层次？郑岩教授的方法启示大家，美术史研究不仅需要宏观的文化视野，更需要显微镜般的细致观察，在熟悉的材料中发现陌生的细节，在静态的图像

中捕捉动态的创作思维。这种训练对于打破研究中的“视觉惯性”、重构现代人与古代艺术品的对话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二、石壁的秘密：考古学视野下的营造工程

当日下午，北京大学彭明浩副教授的《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则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研究视野。彭明浩将考古地层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石窟研究，通过分析山体崖面、斩山遗迹、空间层次等工程痕迹，重构了古代工匠的营造逻辑。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在于，它将静态的石窟转化为动态的施工过程，让人们看到的不再只是艺术成品，而是一个包含规划、设计、开凿、调整等复杂环节的“活态”工程系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明浩对工程遗迹间“打破”与“避让”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古代工匠面对岩体时的技术抉择与应变智慧，这种微观层面的工程考古为理解大型石窟集群的组织实施提供了全新视角。

三、历史的跨度：考古发现与学术史重构

次日，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以《云冈石窟的考古发现》为题系统梳理了五次重要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学术史的多重维度。报告不仅介绍了考古发现本身，更揭示了这些发现如何逐步改变人们对云冈的认识图景——从单一石窟艺术研究扩展到包含寺院遗址、生活遗迹在内的综合性考古学探索。王雁卿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北魏平城的地理范围、城市布局、云冈石窟的自然环境以及云冈石窟的开凿、续凿和修缮历程，讲述了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云冈石窟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调查。最后，王雁卿结合自己在云冈研究院多年的工作经历与研究成果，依照从东至西的顺序，详细介绍了云冈石窟各个发掘地点的考古

成果、现状以及仍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王雁卿对“仍需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强调，尤其体现了资深学者的问题意识，她指出的东西区差异、窟前遗址性质等问题，实则为青年学者指明了可能的研究生长点。这种将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反思相结合的讲授方式，使学员们得以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更远的研究地平线。

四、造像的身体语言：研究课题的深度拓展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清泉教授的《造像的型态、尺度与技术》则展现了造像研究的当代转型。通过对青州龙兴寺造像的个案分析，李清泉教授示范了如何从造像的物理属性（尺寸、姿态、服饰细节等）解读其功能意义与文化密码。特别具有方法论启示的是，他提出当缺乏文献支撑时，研究者可以通过“技术分析”接近古代工匠的创作逻辑——比如通过观察造像背部的加工痕迹推断其原始陈设方式。这种“以物论史”的研究路径，不仅适用于佛教艺术研究，也为整个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范式。

五、学术共同体的生成：跨学科对话的实践场域

工作坊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专家授课中，更蕴含于其精心设计的交流环节。首日晚间的学员报告会聚焦北朝石窟与造像，次日的西部石窟图像专题讨论，以及穿插其间的评议环节，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学术对话网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评议的专家来自考古学、美术史等不同领域，他们对同一研究对象提出的多元问题意识与分析方法，生动展现了跨学科交流的创造性张力。山西大学武夏副教授《试析程哲碑》的报告，更是将讨论从佛教艺术延伸到更广阔的碑刻研究领域，这种学术视野的拓展恰是工作坊倡导的“多角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授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副教授主讲《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

研究”的最佳注脚。

在数字化技术日益渗透考古学的今天，第七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坚持“回归田野”的精神品格尤为可贵。学员们亲手触摸石壁的质感，用最传统的手工测绘感受古代工匠的创作轨迹，这种“具身认知”是屏幕前的数字研究无法替代的学术体验。工作坊对云冈7、8窟的重点关注，既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也体现了“小题大作”的学术智慧——通过两个洞窟的精细研究，折射整个云冈石窟乃至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方法论思考。

从郑岩教授的“视觉训练”到彭明浩的“工程考古”，从王雁卿的“发掘史重构”到李清泉的“形态解码”，本届工作坊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体系。这些不同的学术路径并非彼此割

裂，而是在“理解中国石窟”这一共同目标下形成了互补与对话。这种多元一体的学术格局，正是当代中国石窟研究的生动缩影——在尊重学科差异的前提下寻求深层互动，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

夕阳西下，学员们结束了一天密集的学术活动后，那些关于眼睛与石壁、技术与艺术、个体与传统的思考仍在延续。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中心主任王雁卿表示，第七届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以其扎实的学风、开阔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活力，不仅培养着新一代石窟研究人才，也在悄然塑造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范式。那些在洞窟中展开的讨论与争鸣，终将汇聚成中国石窟寺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清越回声。

云冈石窟佛教寺院遗址出土北魏时期的遗物概述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主要内容简介之一

侯瑞 马骏宇



石雕佛首（北魏）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北岸，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大小编号洞窟254个，其中主要洞窟有45个，附属洞窟209个，各类佛教人物造像59000余尊（身）。本书选取云冈石窟窟前、山顶及鲁班窑石窟历次考古调查发掘出土和采集发现的北魏时期典型文物，以展现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

一、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出土采集遗物

1992年、199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组成的云冈联合考古队，先后两次对云冈石窟第9~20窟、第1~4窟的窟前地面以及第3窟的窟内进行全面的清理与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出土遗物主要属于北魏、辽金、明清时期，其中北魏时期文物主要为石雕塑像、建筑材料以及生活用具三大类。

（一）西立佛：1992年，云冈联合考古队，在云冈石窟第20窟西侧前集中发掘了大量石雕塑像，有133件。这些石块发

掘出土时排列有序，显然是人工有意摆放的，其中雕刻主要为佛像工程。加上1991年降低窟前地面工程时采集的衣纹残块，以及1940年日本学者在第20窟前发掘发现而后移至第12窟前探沟填埋，并于2013年被再次发现的此类石雕塑像残块，共计152块。这些石雕塑像多数前面雕刻衣纹，顶部凿有卯口。经过整理，将这些石块拼接为一尊立佛像，上下约有17层连续或断续石块层叠，每层高度不等，基本在0.25~0.35米，但同一层的石块高度几乎一致。纵向有6~8列石块排列，宽窄不一，上下交错，对接处的缝隙多在衣纹沟槽处或不大影响形象的地方。立佛像着通肩衣，存颈部以下至腹部以上区域，高、宽各约5米。立佛左手高举于胸，手背朝外，掌心握衣角，拇指、食指和小指伸直，中指、无名指微曲。根据石雕塑出土位置及其拼接后的样貌判断，该佛像应为第20窟西立佛。但这些石雕塑的岩性与第20窟西立佛所在岩层岩性不同，且石雕塑有卯口，出土时排列有序，应是原西立佛坍塌后的替代物。石雕塑被用来以卯口互相接合重塑西立佛，但不知为

何并未完工，被遗落在第20窟前，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二）千佛造像：第14~20窟前出土了大量的石雕塑千佛造像。这些石雕塑千佛造像应是昙曜五窟外立壁雕刻的小千佛龕，如今我们在昙曜五窟外立壁仍可见大量的石雕塑千佛造像。其中第20窟前出土的石雕塑千佛造像残件，龕与像多分离，呈片状，属于浅层剥离。残件表面多呈粉红色，岩石表面覆有烟熏黑色，说明这些千佛造像是因为窟前建筑焚毁而从高处的岩壁剥落崩裂掉下。这些千佛造像毁损程度不同，断裂形状各异，小块的有一龕或半龕，大块的有数龕至数十龕。但造像的龕形大小、高度、宽度基本统一，具有一定的规则范围；造像的风格表现形式多样，衣纹、龕楣各有差异。关于这些石雕塑千佛的雕刻时间，有学者根据第17窟明窗东侧壁的太和十三年龕，发现其周围雕刻的千佛龕避让了该佛龕，所以判断千佛龕的雕刻上限是太和十三年（489）。此外，根据诸多壁面上存在的石雕塑千佛龕有意避让已开凿梁孔的情况，可以判断石雕塑千佛龕的开凿不早于窟前建筑，也有可能同时营造。此外，在窟前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千佛首像带有金箔，而在今天我们仍可以在第19窟明窗两壁看到贴有金箔的千佛龕，这说明昙曜五窟外立壁的石雕塑千佛可能贴有金箔，我们可以想象其当年的辉煌灿烂。

（三）带盖石盒：第20窟前遗址中出土有两件带有盖子的连瓣纹石盒。两件石盒周身和器盖均雕刻连瓣纹，连瓣线条饱满、简洁，其中一件石盒底部还阴刻有铭文“妙兴西北方主”。

有学者认为这两件石盒与健陀罗地区早期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舍利盒应为一类。健陀罗地区早期佛教艺术中常出现此类连瓣纹石盒，用于盛放供奉佛教圣物，如舍利或七宝等。

关于其中一件石盒底部所刻铭文，有学者认为“西北方主”很可能反映的是佛教十方世界、十方佛信仰。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北方主”可能指的是以平城为都城的拓跋鲜卑政权，前面加“妙兴”二字，很可能意在祈愿北魏王朝的统治兴盛。

（四）生活用具：生活用具主要在第3窟遗址中出土，在第3窟的前室和后室中出土有大量陶器。这些陶器装饰的纹样以方格纹、三角纹、水波纹、忍冬纹、凹弦纹、暗刻弦纹为主，而这些纹饰也是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及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纹饰的流行样式，同时这些陶器的器型样式也与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太和年代墓葬中所出土的陶器相似，由此可见这些陶器的年代或在北魏太和年间。此外第3窟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北魏时期陶盆，而大同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陶盆较少。这可能是北魏时期丧葬习俗与日常生活习俗不同之处的表现。这些生活类遗物的发现，说明第3窟在开凿工程停止后可能成了一个生活场所。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由云冈研究院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石盒（北魏）

“云冈礼物”受青睐

本报记者 赵喜洋

连日来，云冈石窟景区依然游人如织。当游客游览至第20窟，云冈大佛带来的震撼和惊喜也到达顶点，人们或对视、或击掌，尽情享受20窟大佛带给人的温暖气息。

然后，顺着20窟前的莲花大道往南走，远远便可以看见一座玻璃房子，房子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云冈石窟文创产品，设计者将云冈石窟代表性的纹饰、造像、动物等题材提取出来，做成常见的伴手礼物，比如胸针、冰箱贴、书签、包袋、笔记本、扇子、钥匙扣、丝巾、水杯等，其中“云冈礼物系列”“云冈锦绣系列”和“云中永恒系列”深受游客喜欢。

记者走进“云冈礼物”店内，舒适宜人的室内环境瞬间给身体降温，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前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有的游客在看菩提树香皂，它的创意来源于气势磅礴的云冈石窟造像，佛像双耳垂肩，双手做禅定状，造型端庄凝重，香皂本身采用氨基酸材质，更加温和不刺激；有的游客在看云冈石窟锦绣窄长巾，它的创意来源于云冈石窟传统莲花纹饰、龙纹饰和飞天图案，飘逸的飞天灵动飞翔，动静结合，既富有生活气息和装饰意味，又反映

了北魏文化的时代精神；有的游客在看冰箱贴，“飞天”“二佛对坐”“音乐窟”“魏碑”“瓦当”等，包含各种云冈石窟元素；还有一些游客在云冈笔记本上盖章，有菩提树、思维菩萨、套色的飞天伎乐、佛本生故事图等各类印章，游客在集章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云冈石窟元素，加深了对云冈石窟的印象，同时把集章册留作游览云冈石窟的纪念。

除了这些可爱的伴手礼，有些游客也会购买一些云冈图书带回家，书架上厚厚的《云冈石窟全集》代表了云冈石窟的学术成果，《云冈石窟之谜》《云冈石窟十看》《云冈研究》等书深受游客喜爱，他们在休息区喝茶的同时，手里也会抱几本云冈石窟的书籍翻阅。

店内一位工作人员说，云冈石窟作为大同的热门IP，是见证文明交流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涉及雕刻、美术、舞蹈、音乐、建筑等方面，云冈石窟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文创产品不仅宣传了云冈石窟文化，更拉近了游客与景区的距离。

关于云冈石窟景区优化售检票方式的公告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

为更好地满足旅游旺季广大游客的游览需求，践行“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打击“囤票、倒票”行为，进一步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营造便捷有序的旅游环境。我院决定从即日起，在坚持门票全面预约的基础上，优化售检票方式。具体公告如下：

一、未提前预约门票的政策性免票人群（包括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警察、烈士遗属、残疾人、

60周岁以上老年人等）可持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有效证件直接验证入园。

二、线下设置应急售票窗口，位于游客服务中心；每日投放3000张应急票，售完为止。

三、如游客人数达到景区最大承载力，停售应急票；未提前预约门票的游客（包括政策性免票人群），停止入园。温馨提示：由于应急票数量有限，请游客朋友们提前预约门票，合理安排出行。

感谢您的配合！

云冈研究院